

SWTS

教授当年

谢泳 著

SHUOWEN
TANSHI
CONGSHU

談父談史叢書



百花文艺出版社

CHANGHESHIBEI
HENGSHENGXIEZHANGJI

ELINMANBU
BOGUJIN

NDIJIAN
SHOUDANGNLAN

教授当年

谢泳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I267
1527

SBY 15/52

教授当年

作者 · 谢泳 著

出版发行 ·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经 销 ·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厂

850 × 1092 毫米 1/32 开本 插页 4 印张 8.25 字数 165000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 000

ISBN 7 - 5306 - 1612 - 9/I · 1441 定价：12.50 元

自序

这是我的第三本杂感集，内容与《旧人旧事》《学人今昔》是一致的，我信守在《学人今昔·后记》中说过的话，已收入前两集中的文章，不再收入本集，和《学人今昔》的体例略为相同的是本集也收了几篇论文，这是我特别要说明的。因为喜欢读随笔杂感的人，不一定喜欢看论文。收入了一些论文，是因为论文集时下不如杂感集容易出版，我也只好借杂感的光，而使一些论文也能有机会与读者见面，我已出版的三本书虽然都是杂感集，但也大体代表了我近几年的研究工作。

我是从研究报告文学开始进入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我最初选择储安平为研究对象，有一个心理原因，就是我父亲在 1957 年的反右运动中也是一个右派，严格说他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因为他只受过初等教育，文化水平并不高，只是有一点好读书的天性，所以也就为那些不读书但却领导着他的人看不惯，他在文革中死于车祸，不到四十岁，也就是我现在的年龄。我是有右派情结的，我做报告文学研究时，用力最多的是刘宾雁，因为他是右派，后来做《观察》周刊研究，也是因为储安平是一个没有改正的右派。他

的结局是一个谜,没有人能说清楚他最后去了哪里,一个青年时代怀着强烈宪政和民主梦想的人,就那样消失了,那年他只有五十七岁。储安平成为右派的直接原因是他给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了一点意见,他用了一个词:“党天下”。这个说法不是储安平发明的,三十年代罗隆基就用过,不过他那时是说国民党的。储安平一生的理想是想在言论界有所作为,他的前半生大体上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观察》周刊在当时的最高发行量是十万份左右,而且出了西南航空版和台湾航空版,以后的事就不用多说了。我开始以为储安平的悲剧是个人的,但随着材料的不断发现,我感到这不是哪一个人单独的悲剧,而是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群体命运,因此我又开始寻找一个更有代表性的群体来进行分析,于是有了对西南联大的关注,从一个人一本周刊再到一所大学,从言论自由到大学独立,这是一种曾经有过但后来消失了的追求,为此不知有多少人付出了他们的生命。我在那本没有出版的《〈观察〉研究》的扉页上写过一句话:“谨以此书献给储安平先生及所有终身为自由主义理想奋斗的中國知识分子”。我把该书的一个副本送给了现在澳大利亚定居的储安平先生的儿子音乐家储望华先生,以表达一个陌生晚辈对他父亲的敬意,无论是随笔还是论文,我对前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敬意始终不曾消失,也许这使我的研究可能不够客观,但这也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如果这种情绪能对读者有一点影响,也是我所期待的,我不是一个为学术而学术的人。

1998年3月26日于山西太原南华门东条

目 录

人 物 篇

陈寅恪为什么离开北平	3
也说郭沫若和陈寅恪	8
金毓黻对陈寅恪的评价	12
胡适与陈寅恪	15
再说张东荪	18
胡适与冯友兰	25
怎样评价傅斯年	30
吴世昌的选择	34
令人困惑的梁思成	43
晚年曹禺	46
由王瑶想到陈旭麓	50
舒芜：回到起点	54
范文澜的无奈	60
谁给了周扬压力	62

梁漱溟与储安平	65
储安平与他的前辈	68
金岳霖的三个学生	71
金岳霖的名言	74
胡适对赛珍珠的评价	76
《胡适与补选中央研究院院长的风波》补正	78
毛泽东与北大	81

议 论 篇

《客观》周刊	87
记住这位文化老人	90
五四人物的职业	93
传记不如年谱 年谱不如日记	95
胡风案对知识分子的影响	98
还是他们	100
经典的魅力	102
无奈的群体	106
过去的“启事”	110
作家的眼睛	114
致友人书	117
怎样认识苏联	122

(附:邵燕祥先生致作者的一封信及作者的复信)

潘光旦与《通往奴役之路》	129
有意味的百分比	132
珍惜思想遗产	137

清华学者看老舍	140
怎样了解过去	142
以小见大	144
书不在厚薄	147
《围城》、《南渡记》和《一九三七年的爱情》.....	149
一本有启发性的书.....	152
电视与学术明星	155
作家的民间立场	158
1959：谁在思考	161
——读《顾准日记》札记	
毕业论文	166
蒋梦麟的一件旧事	168

研 究 篇

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	173
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大学教育	183
《观察》与《现代评论》《新月》之关系	191
三个教授的命运	200
一个学科的消失	213
关于鲁迅《热风》中是否有周作人文章之再评价	221
鲁迅、郁达夫日记的比较阅读	230
傅斯年与西南联大	239
从《观察》的言论看四十年代大学教授	247

人
物
篇



陈寅恪为什么离开北平

近年许多有关陈寅恪的专著和文章中，对于 1949 年前陈寅恪离开北平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想法是陈先生离开北平系因生活和身体的原因，与政治没有关系。论者常引用的话是邓广铭先生的一段回忆，陈寅恪离开北平时，曾与邓广铭话别：“胡先生因政治上的关系，是非走不可的；我则原可不走。但是，听说在共产党统治区大家一律吃小米，要我也吃小米可受不了。而且我身体多病，离开美国药也不行。所以我也得走。”这是邓广铭先生在广州中山大学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所讲的。当时邓广铭先生年事已高，他的记忆不一定准确，因为这个说法和浦江清当年的日记有区别。浦江清曾做过陈寅恪的助手，他当时的日记应当是分析陈寅恪离开北平原因时较为可信的资料。

浦江清在 1948 年 12 月 12 日的日记中说：

晨九时，访问寅恪。……他虽然双目失明，如果有机会，他愿即刻离平。清华要散，当然迁校不可能，也没有人敢公开提出，有些人是要暗中离开的。那时候左右分明，中间人难于立足。他不反对共产主义，但他

不赞成俄国式共产主义，我告诉他，都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未必就是俄国共产党人，学校是一个团体，假如多数人不离开，可保安全，并且可避免损失和遭受破坏，他认为我们的看法是幻想，……并告以据我所闻，陈雪屏来北平，似为抢救若干教授学者，给予便利以南行，惟人数必有限制，极少数。陈先生如有行意，可通知梅公。陈谓他早已知道此消息，并已洽梅公云云。他谢我特为通知的好意，并且劝我也可去梅公处登记。……陈先生认为，清华园附近即有战事发生。

（《清华园日记》223、224页，三联版）

从浦江清的日记中可以看出，陈寅恪离开北平绝非和政治没有关系。另外许多人说当年国民党往北平抢运教授是派陈雪屏去的，这种说法也只是一种传闻。证之胡适日记，可以看出，当时陈雪屏并没有亲自到北平抢救教授，而只是在南京具体负责和胡适等人保持联系。为了说明这个史实，我把胡适的日记抄在下面，所据为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9年版的《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0册。

1948年12月14日 星期二

早晨还没有出门，得陈雪屏忽从南京来电话，力劝我南行，说即有飞机来接我南去。我说（此处原文有5个字不清楚——作者注），十点到校，忽雪屏电：“顷经兄又转达，务请师母即日登程，万勿迟疑，如有人来洽机，宜充分利用。”毅生和枚荪均和我走。我指天说：“看这样晴天无片云，从今早到现在，没有一只飞机的声音。飞机已不能来了！”我十二点回家，又得电报。机仍无

消息。到一点半始得剿总电话，要我三点钟勤政殿聚会。后来我们（有陈寅恪夫妇及二女）因路阻，不能到机场。

从这天的日记可以知道，当时那样的情况下，陈雪屏并没有到北平。当时北平的交通已基本瘫痪。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同一天的记载是：“诣东大上课，兵车塞路，行旅甚艰。……”（第9册 6738页，辽沈书社）与胡适所述情况完全相同。胡适第二天的日记是这样的：

1948年12月15日 星期三

昨晚十一点多钟，傅宜生将军自己打电话来，说总统有电话，要我南飞，飞机今早八点可到。我在电话上告诉他不能同他留守北平的歉意，他很能谅解。

今天上午八点到勤政殿，但总部劝我们等待消息，直到下午两点才起程，三点多到南苑机场，有两机，分载25人，我们的飞机直飞南京，晚六点半到，有许多朋友来接。

儿子思杜留在北平，没有同行。

陈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对此的记述是：“1948年12月15日，一架小飞机冒险在北平南苑机场降落，集学人兼具幕僚色彩于一身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匆忙登机，从而拉开了‘抢运学人’的序幕。”（该书3页）这里的记述显然也有想像的成分。胡颂平在《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说：“12月15日，下午四时以后，先生夫妇坐了蒋总统派去的专机南下。这时到南苑机场的交通已不安全，傅作义派了部队护送先生等上了飞机。”（2063页）从这些记述中可

以看出，胡适、陈寅恪他们离开北平时，并不像现在许多传记中描述的那样。

陈寅恪离开北平时，已是双目失明，而且年近六十，按常规推论，此种境况，确实不易再动，但从目前已知的材料中可知，陈寅恪在去留问题上是从不曾犹豫过，以他和清华的关系之深，他本来是可以不走的。在陈寅恪的南迁问题上，一直有赴台说还是客居岭南说两种看法，目前虽然我们还没有见到陈寅恪确有赴台之意的可靠史料，但陈寅恪的真实心理，从他果断离开北平看，说他有赴台之意，也并非没有一点可能。毛子水在《记陈寅恪先生》一文中就说过：

陈寅恪在岭南大学教书，颇想来台但以不知道台湾生活情形，所以不敢动身。我当时听到他有意来台的消息，即想写信劝他来，……由于素向的懒性，想而不做。若使当初我马上写信，寅恪来台的可能性或较大。

（俞大维等著《谈陈寅恪》第22页，台湾传记文学版）

文革中，陈寅恪被迫所做的第七次交代底稿中的“愿留在国内”的说法，不足为信。以他和傅斯年的友情，傅斯年的选择不会对他毫无触动。蒋天枢八十年代初给汪荣祖的信中说：“其时胡适在沪，力劝先生去台，先生和师母都说不去。”（《陈寅恪评传》第163页）这个说法也需要细加分析。当时胡适劝陈寅恪赴台，而他自己尚未确定今后的去处。1949年1月14日，胡适才在上海把江冬秀和傅斯年夫人俞大绾送往台湾，他又返回了南京。2月4日，南京政府迁到广州。胡适劝陈寅恪是南京政府迁到广州之前，这期

间,他们对时局的判断会发生变化也是可能的。现在看来,傅斯年逝世后,陈寅恪抄给向达、邓广铭那首怀念傅斯年的诗,未尝没有遗憾的意味,当然这只是笔者的一点推测了。

也说郭沫若和陈寅恪

谢保成先生《郭沫若与陈寅恪晚年的“龙虎斗”》(《中华读书报》1997年11月12日)一文,述及六十年代初郭沫若与陈寅恪的关系,有些断语下得缺少余地,在评价郭陈关系时,也是猜测的成分多于具体论证,特提出几点意见,以就教于谢保成先生。

郭陈六十年代初就《再生缘》所发生的争论是近年研究陈寅恪的人很关注的,对于郭陈之间的关系,人们都倾向于面和心不和,很少有人简单地将郭陈二人之间的偶然交往,看成是两个不同史学家之间的友谊生长,而谢文却认为:“郭沫若吟出本文开头的那副对联,陈寅恪听后喜笑颜开颇感惬意”。这样的断语下得太肯定,几近于小说家笔法了,而这是不符合郭陈二人交往事实的。平心而论,在这场关于《再生缘》的争论中基本没有非学术的因素干扰,还算是五六十年代少见的学术性争论,但细心的人能察觉到无论争论多么深入,也无论有多少新材料出现,陈寅恪始终不予正面回答,不回答,不等于不吸取争论的研究成果,而是陈深深懂得他所面对的争论对手和他不在同一地位上,再往深里说,陈寅恪研究《再生缘》主旨并不仅在考证其书及其

作者,余英时分析较为合理,即:“尤在借此以保存他的‘心史’——即文中所抒的感叹和所附的诗篇。”(《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它》79页,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如果不从陈寅恪1949年后的整体思想倾向着眼,而硬要把郭陈之间的一点学术关联,说成是两位大师的握手言和,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其实关于《再生缘》的争论,只是由陈寅恪的著作引出,之后他再没发一言,如果他的心情舒畅会取这种姿态吗?如果郭陈和解,那么七十年代初,郭写《李白与杜甫》时会说:“陈氏不加深考,以讹传讹”,“他的疏忽和武断真是惊人”(《李白与杜甫》6—1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等语吗?

前说郭陈之争,再说郭陈相会。

许多研究陈寅恪的人都很想搞清楚1961年郭陈相会的详情,但遗憾的是关于郭沫若两次访陈寅恪的情况,在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二书中均只字未提,而这两部最接近史实的著作中都曾写到了1961年陈寅恪的活动。另外龚继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中关于《再生缘》的每一争论进展都有详细记录,独不见郭沫若访陈寅恪的记载,所以在郭沫若日记,吴宓日记尚未出版的情况下,任何人关于郭陈相会的情节可能都是自己的回忆,有一定价值,但不能作为信史看待。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册中收有从1961年1月1日起致王戎笙的24封信,最后一封是1966年9月2日(有一封没有年月日),其中有数处涉及《再生缘》一事,但从未提过他在广州访陈寅恪的情况。龚继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中引述了1962年第1期广东《学术研究》中的一则资料:“本月在广州邀商